

全球智库半月谈

比特币即将震撼世界：你准备好了吗？

区域贸易谈判蕴藏高风险

亚洲经济或将迎来转折点

全球及区域金融安全网：欧洲和亚洲的经验

欧元区的幸存——惨淡的胜利？

中国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地区海事安全的新热点

本期编译

陈 博

郭子睿

黄杨荔

孔莹晖

刘 洁

刘兴坤

马文龙

靳 航

王 雷

许平祥

杨盼盼

朱振鑫

(按姓氏拼音排序)

赵 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黄杨荔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比特币即将震撼世界：你准备好了吗？	4
--------------------------------	---

导读：估计再有几年时间，大多数人就将使用比特币作为商品交易工具，现有的金融体系将失去市场。当那一天来临时，世界就准备颤抖吧。

区域贸易谈判蕴藏高风险	7
--------------------------	---

导读：从中短期来看，国际贸易未来主要依赖于区域贸易谈判的结果。TPP 虽然很重要，但是多哈回合谈判也不应被抛弃。

全球治理

多哈回合“死亡”了吗？	10
--------------------------	----

导读：多哈回合陷入了谈判的“死亡”困境，取而代之是双边或区域的贸易协议，如 TPP 和 TTIP，这对多哈回合是一个强烈的冲击；那么多哈回合的未来前景如何？在此背景下，世贸组织的角色如何定位？

亚洲经济或将迎来转折点	14
--------------------------	----

导读：2013 年四季度，亚太地区新闻不断，例如中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日本启动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推进 TPP 谈判进程。这都预示着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步入转折期。

全球及区域金融安全网：欧洲和亚洲的经验	17
----------------------------------	----

导读：亚洲金融危机（1997）和欧债危机（2009）都促进了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发展，本文分析了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金融安全网，并分析了它们与全球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关系，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建议。

经济政策

自然利率研究框架综述	20
-------------------------	----

导读：本文围绕维克塞尔框架对自然利率的讨论及该理论的学术争议，对自然利率的研究框架作了综述性回顾。

基尼系数为什么迅速提高？ 23

导读：收入不平等状况现已达到历史高点。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国民收入的一半。这种掠夺性的分配状况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美国从未出现过。在很多发达国家，近期这一恶化速度已经升至20多年来的最高点。本文揭示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两个原因，即资本账户自由化与财政整顿政策，并建议各国政府应在这些政策与其带来的分配效应之间作出权衡。

欧元区的幸存——惨淡的胜利？ 27

导读：欧元区在欧债危机之中幸存，但也留下了较多隐患。金本位体系的解体或许能给我们一个历史参考，让我们更好地评价欧元区的得失。作者认为，当时退出金本位这一固定汇率体系事实上有助于各国复苏，今天的欧元区尽管维持了相对完整，但也错过了很多复苏的机会，付出了一定代价。

聚焦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 30**

导读：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消费疲弱。但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作者认为，随着改革推进，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终将上升，并最终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产业集聚与出口政策 33

导读：本文研究了中国的产业集聚与出口表现，并提出三个政策建议：第一，出口政策应充分利用产业集聚效应；第二，政府应提供出口培训等公共品；第三，低附加值产业与内陆产业面临更高出口成本，应给予补贴。

战略观察**《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对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36**

导读：2013年6月，朴槿惠总统访华，两国共同发布了《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这份文件显示了新时期韩国希望巩固并加强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决心。韩国意识到，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韩国对华政策要做出调整。当前，东北亚战略安全环境竞争加剧，朴槿惠政府希望韩国扮演地区和平协调人的角色。

中国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地区海事安全的新热点 39

导读：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发布划设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立刻引起各方的关注。中国周边国家如美、日、韩等国都早已建立起自己的防空识别区，中国现在划设自己的防空识别区本是无可指责的正当行为，却引来很多非议，本文作者也认为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中国提高了东海争端中的赌注 42

导读：作者认为中国本次宣布新的航空防卫识别区的举动增加了中日两国在东中国海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同时，这种行为也被视为是对美国的挑战，因此美国对此表示了明确的反对。在这一地区中日两国不断增加的军事互动提高了冲突发生的风险，因此在减少风险和避免误判方面展开合作应该是中日两国的首要任务。

本期智库介绍 45

比特币即将震撼世界：你准备好了吗？

Michael Taylor /文 朱振鑫/编译

导读：估计再有几年时间，大多数人就将使用比特币作为商品交易工具，现有的金融体系将失去市场。当那一天来临时，世界就准备颤抖吧。编译如下：

当你惊讶于新技术的破坏力的时候，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比特币本来有机会悄悄地颠覆整个金融世界。但现在不行了，它太出名了。仅仅一个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比特币研讨会就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成为当地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头条新闻。比特币的故事涉及货币，黄金，外星人，和用算法来取代现任政府，所以怎能不引人入胜？

神秘的国际人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历史。现在最伟大的创新不再来自传统的研究实验室，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宿舍，比特币也一样。

但比特币的始作俑者一直是个谜，所有的身份核实都无法确定是谁发明了比特币。这种匿名性正好适用于这种基于 P2P 网络的开源性与密码原则。事实是，比特币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每一个人。

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在这之前，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开创性的信息技术和金融的创新，但只不过是让传统的金融服务变得更加便捷。而比特币不一样，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问题也在这里。在我们熟知的世界里，每一个机构，信用卡，或者金融服务商都有自己的分类账。每次我们进行转账的时候，金融机构就相应地调整我们的账户余额，以此来收取手续费。不仅如此，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交易越来越电子化。每笔交易都附着个人信息，这或许对追查罪犯有帮助，但也成为了政府监察人民的工具。

比特币有两个明显的好处。首先，它使交易匿名化，就像现金交易。交易时不会泄露个人信息。其次，因为比特币只有一个巨型的云账户，所以交易的手续费近乎为零。举个例子，用比特币买一条面包，和在地球的两端进行巨额现金转账，手续费都几乎为零。

中介

但是，在我们为结算所、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终结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想一想它们最初产生的理由，那就是便利。

正是由于便利，我们才回去使用这些金融中介机构的服务。传统的银行即使有很高的手续费，但也比用整麻袋的现金结算便宜。比特币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不管对于买方还是卖方，金额大还是小，它让所有的金融交易变得同样便捷。但对于金融中介机构来说，比特币将会使他们陷入噩梦。

鲜明对比

Jon Matonis 讲了一个展示比特币和传统金融体系截然不同的例子。当他在布鲁塞尔 SWIFT 的总部发表演说时，他问工作人员能不能让他看一看每纳秒的实时交易数据。但是他被告知，银行总账属于私人信息，并且电脑被放在一个上锁的房间里。相比之下，比特币的结算系统是完全分散的，信息也是完全公开的。整个系统是开源的，即使在回宿舍的路上也一样能看。

比特币世界的另一个转变涉及贷款。在比特币的世界里，根本没有虚拟的钱。银行不能借出比他们储蓄更多的钱。他们要想借钱，就得先拥有那些钱。可能的情景是，借款行为在比特币世界里将会无处不在，就好像群众集资一样。但是，现在的世界太沉迷于信贷了，如果信贷减少，影响谁也无法确定。

“52 区”

比特币的广泛分布使它具备难以置信的弹性。如果 SWIFT 的基站或者网络受到攻击，那么外汇市场就难以为继。但比特币不会。任何地区的任何电脑的丢失都不影响比特币。没有了那些电脑，比特币照常运行。

仅仅是个古怪的科学发明？

上述的众多优点只是表面，比特币真正的杀伤力是针对政府的。虽然类似德国的一些开明政府已经接受了比特币，但多数政府依旧持怀疑态度。一些国家，比如泰国，甚至禁止比特币交易，这是为什么？

比特币的卖点在于它不仅能够规避政府的货币政策，还能严格限制政府的财政政策。这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不是经济学家的我们，这样的解释比较便于理解。首先，在货币方面，央行通常有权设立基准贷款利率或贴现率。如果政府需要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还会不断印钱。他们还喜欢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卖自己的债券来控制市场。而在比特币的世界，算法控制了一切。央行再也不能依赖那些新创造的货币了，量化宽松也就不复存在了。

其次，在财政方面，收入越来越难追溯到个人，财政政策不得不将税收转向支出方。这不仅会降低政府的收入，而且通过这样的倒逼作用，政府可能还要被迫去平衡财政预算。

所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比特币的爆炸式发展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将会听到传统金融中介商的抗议，至少在西方国家。在亚洲和非洲，变革可能发生的更快。我估计再有几年时间，大多数人将用比特币作为商品交易工具，而拒绝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当那一天来临时，世界就准备颤抖吧。

本文原题名为“Bitcoin is poised to shake the world: are you paying attention?”。本文作者 Michael Taylor 是亚当·斯密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于 2013 年 11 月刊于亚当斯密研究所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区域贸易谈判蕴藏高风险

Jaime Zabludovsky Kuper 和 Sergio Gómez Lora/文 靳航/编译

导读：从中短期来看，国际贸易未来主要依赖于区域贸易谈判的结果。TPP 虽然很重要，但是多哈回合谈判也不应被抛弃。编译如下：

国际贸易谈判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正面临危机，由此导致的谈判真空期正在被区域贸易谈判来弥补。

至少从中短期来看，区域贸易谈判的结果将极大地影响国际贸易的未来发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由于其经济及战略上的重要性备受关注；但同时，多哈回合谈判能使全球国际贸易发展更上一层楼，因此也不应被抛弃。

WTO 与多哈谈判僵局

WTO 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关贸总协定（GATT）——WTO 的前身，曾成功推动 8 轮多边贸易谈判，50 年间建立起一系列降低贸易壁垒的规则。在 GATT 的不懈努力下，过去几十年间，国际贸易流量大幅增加，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仅如此，GATT 的一系列成就还使其成员国数量快速增加。从最初只有 23 个发起国到目前涵盖全球 159 个国家，GATT 从一个原始独立的贸易协定成长为成熟的国际组织。

但是，曾经推动 GATT 与 WTO 获得成功的因素，目前却成为限制其自身发展的主要障碍。协商一致、一揽子承诺、“最惠国”等曾经促使并规范各国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原则已成空谈，各国只想坐享其成，谈判进程也被这些国家牢牢把控。

几十年来，创建 GATT 的发达国家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一直从中受益。结果，后加入的发展中国家毫无开放自身经济的动力。协商一致原则规定，通过决议需经全体成员国同意。但如今，该原则使积极的自由化措施无法通过，却使不愿扩大开放程度的国家从中受益。因此，推动多哈回合谈判，WTO 运行规则改革势在必行。在改革过程中，那些积极寻求贸易及投资自由化的国家选择了双边、区域及次区域谈判。

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开放经济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提高生产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各国均从中获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1995 年，多边贸易谈判在乌拉圭取得成功，这是最后一次成功的多边贸易谈判。自此以后，大量较小规模的贸易协定（双边、区域或次区域）被签订。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署引起了跟风热潮，拉丁美洲各国签署了一系列类似的协定。当时 NAFTA 是一个最全面的贸易协定，包含一系列极

具开创性的条款，最终成为了墨西哥及美国同西方世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

穿越大西洋来到欧洲，欧盟继续深化一体化进程。乌拉圭回合签订后的 20 年间，欧盟的成员国数量翻了一番，如今已扩展到 28 个成员国。与此同时，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签订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墨西哥及中美洲国家。自由贸易热潮同时也席卷了太平洋区域，这一地区的不少国家都签订了双边或次区域贸易协定。

当前，两个主要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它们涵盖了目前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国家。如果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达成协议，TPP 与 TTIP 有可能成为推动跨太平洋与大西洋经济一体化的平台。

TPP：战略一体化的先驱

TPP 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P4），于 2006 年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及新加坡四国发起，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域。两年后，随着澳大利亚、秘鲁、越南与美国陆续加入，P4 正式更名为 TPP，引起全世界关注。2010 年至 2013 年间，共有 4 个新成员加入谈判，分别是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12 个谈判国分别涵盖全球 GDP 和贸易的 40% 与 26%。

不管是从谈判议题的数量，还是从设立规则的深度来看，TPP 都是一个宏伟的计划。谈判议题超过 20 项，除了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等方面的市场准入谈判，其他议题还包括：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New Disciplines
Market acces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griculture	Annex TBT
Rules of origin	Regulatory coherenc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ticorruption
Dispute settlement	Telecommunications
Telecommunications	Ecommerce
Annex temporal entry	Environment
Trade remedies	
Financial services	
Legal issues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ext)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tandards	
Services	
Competition	
Temporal entry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出口国，并且 TPP 成员国进出口的 34% 都与中国有关。即便如此，中国仍被 TPP 拒之门外。这将会增加中国推动次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压力。

风险何在？

TPP 谈判极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美国已经同其余成员国中的 6 个签订过自由贸易协定，所以美国主要谈判对象是日本、文莱、马来西亚、新西兰以及越南。

如果 TPP 谈判最终取得成功，世界上的国家将被分为两类：愿意实现真正贸易一体化的国家以及仍未做好准备跳出目前 WTO 规则的国家。对于后者，WTO 至少有两个选择：第一，仍然在多边贸易体系下解决全球贸易争端；第二，采取双轨制谈判策略。

一旦 TPP 与 TTIP 谈判失败，将传递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将不再能够引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自由贸易发展将再无主导力量。

本文原题为“The High Stakes in Regional Trade Talks”。本文作者为墨西哥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本文于 2013 年 11 月刊于 CFR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多哈回合“死亡”了吗？

Jagdish Bhagwati/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多哈回合陷入了谈判的“死亡”困境，取而代之是双边或区域的贸易协议，如 TPP 和 TTIP，这对多哈回合是一个强烈的冲击；那么多哈回合的未来前景如何？在此背景下，世贸组织的角色如何定位？编译如下：

经济学家担心，世界贸易体系存在退化为一系列区域协定的风险。

在八年的多边贸易谈判之后，1995 年乌拉圭回合成功地达成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为之而欢呼雀跃。经过反复且失败的政治尝试，这种坚持带来的成果是值得庆祝的。GATT 是一套贸易中削减关税的临时协议安排，而不是国际性的贸易组织。原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中，大多数国家想成立关于贸易的国际性组织，却没能如愿。WTO 的成立弥补了这种缺憾。

二战后的多边贸易体系，旨在贸易自由化，并在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和减少贫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Bhagwati 和 Panagariya, 2013）。在经历了大量的讨论之后，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及减少贫困的这种关系，现在已被广泛接受。

但在 2011 年 11 月的最后期限，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未能完成；与此同时，出现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却成为了美国和欧盟等大国的首选，这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前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院长莱斯特·瑟罗，在 1989 年著名的达沃斯会议上宣布“关贸总协定已死亡”，该声明似乎过于夸大了。而今天的问题或许是“WTO 死亡了吗？”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从多边贸易谈判转向双边和区域性优惠贸易协定，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 WTO 是否可以挽救。当世界贸易体系已经进入问题的复杂阶段，什么才是它的未来前景呢？我们如何充分利用目前的情形？

多哈回合怎么了？

新一轮的跨国贸易谈判始于 2001 年的卡塔尔首都多哈，即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它的主旨在于降低贸易壁垒，并修改贸易规则。这被视为发达经济体对那些反对国际经济秩序（其中包括战后贸易自由化）而进行的回应。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认为他们的利益在关贸总协定(GATT)的贸易谈判中被忽视了，在所谓的多哈发展议程谈判中，他们发誓不会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事实上，关贸总协定的主旨，通过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享有关税削减的自由裁量权，而无需提供相应的互惠贸易让步。结果是，与认为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一般断言相反，他们的平均制造业关税反而要高于发达经济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达经济体对自己感兴趣的产品普遍采用较低关税，但提高了传统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关税，这成为了发展中国家享有这种“非互惠原则”的结果。尽管援助往往是无回报的，大多数国家还是坚持互惠的贸易让步。所以，当发展中经济体进行贸易优惠的自由裁量，并且要求不附带任何条件或预期回报时，发达经济体则通过产品选择偏见来“处理”该问题：他们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产品减少关税。当然，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相互让步，这种产品选择偏见将有很大可能消失。

尽管存在产品选择偏见，发展中国家还是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了益处。随着发达经济体的自由化和不断繁荣，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市场也随之扩大。二次世界大战和 1986 年期间进行的七回合跨国贸易谈判，能够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充分利用发达经济体的贸易自由化日益增长的市场。外向型国家如韩国和其它东亚国家成功地扩大了其海外市场，并实现了显著的出口和收入增长。然而，其它国家如印度却没能成功。这种对比在于强调：贸易给获利提供了一个机会，但他们必须抓住该机会，而失败往往是源于其自给自足的政策。

然而，最后阻碍、并于 2011 年宣布中止多哈回合的大部分责任不在发展中国家。相反，多哈谈判的让步无法让美国商界游说团体接受。他们认为那些获得更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农业)和巴西(制造业)，应该做出更多的让步。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观点。毕竟，政治上的微小调整（如美国和印度在农业上的共同让步）或许足够获得一场多哈回合的胜利，并实现重要的突破，包括结束农业出口补贴的协议。事实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许多世界领导人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多哈谈判，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 (Julia Gillard)、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 (David Cameron) 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Angela Merkel)，但无济于事。

奥巴马不愿面对美国商业游说团体，他们重申需要发展中国家作出更大的让步。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并需要新的谈判。结果，这样的要求很难得到满足，2011 年多哈回合也是如此。

多哈回合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有两个选择。如果我们认为“多哈回合已死”，这意味着未来的多边贸易谈判已结束，也肯定会使世贸组织遭受破坏。或者我们可以在今年 12 月份的巴厘岛多哈部长级会议达成一个最低协议，如贸易便利化。最后的选择虽然不能令人兴奋，但与那些想以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系的损失为代价的选择相比，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看清对新多边贸易谈判前景的任何损害，意味着需要把世贸组织视为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第一条腿是多边贸易谈判。多哈是第一个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谈判，而在关贸总协定（GATT）下却有连续七轮成功的谈判。第二条腿是规则的制定，如设置反倾销和补贴规则。第三条腿是争端解决机制，这是 1995 年乌拉圭回合的最终成就，使得争议解决对成员国政府具有约束力。

如果多哈被宣布死亡，多边贸易谈判将只能依赖另外两条腿。主要发生于多边贸易谈判的规则制定，将孤立存在或转移至其它地方。如果纠纷是在其他双边和区域组织而不是在世贸组织之中来解决，争端解决机制也会削弱。

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对多边主义具有破坏作用的力量开始兴起，出现了类似美国（泛太平洋伙伴关系或 TPP）和欧盟（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或 TTIP）的具有歧视性的区域性贸易关系。

跨太平洋合作组织（TPP）

TPP，目前处于第 19 轮谈判，拥有 12 个成员；本质上是美国主导，代表了全球贸易的 30%到 40%。世纪之交，美国选择了南美地区，而绕过了更有活力的东亚国家。东亚国家被排除在了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结果是亚洲贸易合作通常把美国也排除在外。美国因此寻求一条回到东亚的道路。较小的国家，如新西兰、新加坡和越南，允许美国重新回到该地区，以抗衡中国在东亚和南亚外交政策。TPP 的建立似乎是为了遏制中国，而不是出于商业动机。

但美国游说团体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旨在能使得贸易更加自由化。怎么会有人反对“现代”“高标准”的贸易协议呢？例如，即使目前美国工会只覆盖了 11%的劳动力，游说团体者仍然试图在 TPP 中加入工会条款。如果接受这些要求是加入 TPP 的先决条件，这将把亚洲分裂为中国、印度和加入 PPT 的国家三部分，这是不可取的。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允许加入 TPP 的国家放宽贸易，减少与贸易无关的附加条款。这就像如果我想加入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我需要打高尔夫球；但是我不应该去教堂唱赞美诗。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

TTIP 是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在 2013 年 6 月共同倡议提出的贸易协议，目前美国和欧洲正在谈判，其与 TPP 相比面临截然不同的问题。首先，两个谈判市场非常巨大，而 TPP 实际上是针对亚洲地区的小国家的，只有到谈判的后期阶段才面临更大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与 TPP 相比，美国游说团体对欧盟几乎没有影响。然而，欧盟内部在有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将延缓谈判。

未来的挑战

贸易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贸易优惠协定是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瑕疵。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加，所谓的价值链是一个误导性术语，因为中间产品指向很多方向，并如此流转回去：法国可能从日本进口钢，但日本钢铁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中间品，包括来自法国；这个苦恼问题的存在使得双边和地区协议不可能得到实现。

实际上，即将离任的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 (Pascal Lamy) 公开谴责贸易优惠协定的扩散，前总干事萨瑟兰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的领导——多边主义的捍卫者——以压倒性多数的投票结果同意贸易优惠计划。

鉴于双边的、特别是大区域协议正在崛起，世贸组织新总干事 Roberto Azevedo 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我建议，在跨国贸易谈判回合几乎破碎的情形下，必须避免其他两条腿——规则制定和争端解决机制遭受损害。Azevedo 必须劝说 TPP 和 TTIP 的领导，在这些地区规则制定和争端解决方式安排中，能充分吸取多边层面的经验和教训。制定规则不能仅孤立于这些区域协定框架之中，它不必排除那些非成员国。同样，在双边或区域争端解决中，必须允许属于世贸组织的非成员发表其观点。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除非 Azevedo 把它作为他的首要任务，否则在一个新的世界多边贸易谈判可能已经消失的背景下，贸易优惠协定是唯一的游戏规则，世贸组织领导权将继续遭受腐蚀。这将是一个遗憾。

本文原题为“Dawn of a New Sytem”。本文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组成成员，曾经担任过关贸总协定的经济政策顾问、联合国全球化特别顾问和世界贸易组织顾问。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刊于 IMF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亚洲经济或将迎来转折点

Matthew P. Goodman/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2013年四季度，亚太地区新闻不断，例如中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日本启动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推进 TPP 谈判进程。这都预示着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步入转折期。编译如下：

2013年四季度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这可能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中国改革，这意味着亚洲地区经济大国的定位将发生改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试探性地启动了经济复兴战略的“第三支箭”；TPP 谈判进程已临近年度期限，本次贸易谈判涵盖了世界总贸易规模的三分之一。上述事件中任何一件一旦获得成功都将具有划时代意义；如果上述事件都取得成功，那么将会创造出接下来几十年的亚太地区经济繁荣发展轨迹。

每逢中共三中全会，新一代国家领导人通常会公布其在接下来 5-10 年期间的改革计划。今年 11 月 9 日-1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几十年来最受关注的一届。多数评论认为本届三中全会的影响力与 1978 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当，当时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战略。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集体并没有消除公众的预期，即预期本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会带来中国经济的重大改革，并且一位党内高级官员在会议召开之前曾预测：“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即将来临”。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11 月 15 日，中国政府迅速公布了长达两万一千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包括 60 条改革计划，几乎涉及到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所有领域，既包括放权独生子女政策、扩大农民产权，也涵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曾经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感受到此次改革所涉及范围之广和野心之大，甚至有些人认为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将会是“革命性的”。

作为对经济改革计划的阐述，《决定》在用词、真实性和官方性方面均具有权威性。《决定》首次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尽管国有控股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竞争成分会不断增加。《决定》将金融和财政改革列为经济改革的核心，预计近期内将出台正式的存款保险计划，进一步扩大房产税的试点范围，从而抑制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还提到要调整中央政府和资金相对缺乏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但是并没有拿出实现这一点的有说服力的路线图。

在中国本次改革计划中，制度创新可谓一大亮点。政府除了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外，还要求设立中央“领导小组”来协调经济改革。虽然关于改革小组的细节和构成仍然只停留在概念层面，但是如果习近平总书记或者李克强总理来亲自领导，那么改革小组将会取代发改委，成为主要负责改革实施的机构。

这进一步验证了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的决心，包括是否能够实施改革以及如何实施改革，甚至试图突破难以攻克的既得利益，包括臃肿的官僚机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但存在的问题是，成就了过去 30 年高速增长政府制度和流程是否能够进一步实现本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列明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呢？

不过，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消除了所有的关于新一代领导人集团能否掌控一切的能力的怀疑；《决定》完全承认，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实施根本性的改革乃当务之急。现在，所有的关注点都聚焦在预计 12 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明年春天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时候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将会对其改革计划细化为具体的政策计划。

同时，在大洋彼岸，日本的经济改革也进入了关键阶段。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即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短期目标是提振经济和结束通胀紧缩。尽管今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 GDP 年化增长率下降到了 1.6%，但是预期在明年 4 月提高消费税之前，还会出现反弹，因为消费者会提前进行大额的购买行为；且日本政府准备了 5 万亿日元的补充支出计划，用以弥补消费税提高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任何负面影响。因此，预期日本通货紧缩能够得到缓解，今年 10 月以及以后的 5 个月内，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将趋于上升。

但是，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成功，最终将取决于其“第三支箭”，即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安倍政府正在努力实施其增长战略中的关键方面，包括通过立法程序建立对医疗保健、农业和劳动力放松管制的“经济特区”；废除 2011 年东日本大震灾之后所征收的企业税；并且提高妇女的社会参与率。

尽管安倍政府正在百般努力的提振日本经济，但是多数人日渐对安倍政府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意愿和能力表示担忧。今年 11 月初，因为日本政府决定不完全放开非处方药的网上销售，前任首相的产业竞争委员会的一位重要官员被迫退出政坛。外资企业不断煽动提高劳动力雇用市场的灵活度以及增加其在企业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此外，安倍经济学的批评者们认为，“女性经济学”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婴儿日托中心。但是，现在判断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失

败也为时过早。安倍的支持者及其团队对提振日本经济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充满信心。

预计 2013 年底达成的 TPP 协议将会开启亚太经济历史的新篇章。11 月，12 个经济体将进行谈判，试图在 12 月初新加坡贸易部长会议之前，缩小他们在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管理和放松市场准入方面的分歧，并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TPP 协议一旦成功达成，必将促进亚太地区区域内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并且有可能发展成为 21 世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规则制定的范本。

本文所讨论的亚太地区的三个发展动向均面临着严峻的政策实施障碍，成功与否仍是未知数。但是，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政治推动起决定作用。如果中国和日本的国家领导人能够将他们的大胆改革计划贯彻到底，TPP 成员经济体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协议（即使不是完美的协议），那么将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创造诸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和机遇。

本文原题为“*Asian Economics: A Quarter for Thirds*”。本文作者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本文于 2013 年 11 月刊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及区域金融安全网：欧洲和亚洲的经验

Changyong Rhee, Lea Sumulong, Shahin Vallée/文 杨盼盼/编译

导读：亚洲金融危机（1997）和欧债危机（2009）都促进了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发展，本文分析了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金融安全网，并分析了它们与全球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关系，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建议。编译如下：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货币体系的解体和随后出现的金融全球化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性增大的原因。在过去的 20 年中，许多国家都曾经因为金融危机而导致经济出现大幅波动，例如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 2009 年的欧债危机。因此，国家都越来越迫切的需要金融安全网，以保护经济体免受短期冲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是全球层面的金融安全网，国家间和区域间的金融安全网也同样出现较大的发展。欧洲和亚洲金融安全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危机的客观推动作用。

亚洲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发展经验

亚洲金融安全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77 年，东盟五国签署了东盟互换协定。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破产，日本于 1998 年 10 月提出了新宫泽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外汇市场的稳定，马来西亚接受了该计划的援助，而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在该计划援助的帮助下，马来西亚的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且没有采取财政紧缩的措施，也没有出现其他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国家出现的社会动荡的现象。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一援助计划颇有微词，但是亚洲国家仍然从中看到了建立区域金融安全网的一线曙光。

在此背景之下，2000 年 5 月东盟中日韩 10+3 会议上清迈倡议最终达成，但是在清迈倡议达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进入了大缓和时期，清迈倡议未能发挥其作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亚洲金融安全网的作用非常有限，韩国和新加坡都是直接与美联储进行货币互换，与此同时清迈倡议中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开始签订双边互换协定，例如韩国与日本，韩国与中国，印尼与日本，印尼与中国等。如何整合这些双边互换协定，形成本地区的资产池和金

融安全网，是亚洲国家面临的任务。2010年3月24日生效的清迈倡议多边协定就是朝这个方向进行的努力。

欧洲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发展经验

欧洲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发展与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不可分的。货币一体化进程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就一直是充满争议的话题。尽管货币区的建立目的在于降低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必要性，但是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却表明，强化地区金融安全网是欧元区的必然选择。

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时，匈牙利遭受了严重的外部失衡和大量的外汇短缺，它迅速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没有考虑借助欧元区的官方力量。这一举动表明尽管欧元区经历了长时间经济、政治和货币的融合，其内部国家仍然有赖于外部支援。这一教训使得欧盟重新捡拾起尘封已久的条约，利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国际收支援助便利，为欧盟国家提供援助。但是，2010年秋天危机蔓延至欧元区，新的区域安全网变得必要。缺乏救助手段使得欧元区的官员们第一次开始考虑来自于外部的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尽管在一开始遭到反对，但是之后也变得不可避免。

发展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建议

加强法律和金融框架。从法律意义上讲，清迈倡议多边合作协议只是成员国之间的协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最近，该协议将各国央行行长纳入其决策过程，并提升其可操作性，是一个积极的变化。而另外一方面，它并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没有固定的出资比例，这使得它的效力受到怀疑，因此，有必要确定固定的资金来源。

增强借款的审慎性。救助国在接受救助之前时常有这样的担忧，即接受救助反而会进一步恶化投资者对本国经济的信心，这便是所谓的污名效应。对于避免这一效应，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解决办法是对外宣布进行这样的救助安排时，并不直接承认已经发生流动性危机，而是将其作为预防性需求对外公布。在次贷危机时，美国向巴西墨西哥韩国和新加坡提供了互换协议，当时便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另外一种方式是分散投资者的注意力，一次对多个国家同时进行救助，这次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这样的救助，但这对资金规模的要求较高。

加强预测和监督能力。预测和监督能力的增强对于区域安全网十分重要，二者都是避免危机发生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建立区域安全网的过程中应当加大投入，提升这方面的能力。

本文原题为“Global and Regional Financial Safety Nets: Lessons from Europe and Asia”。本文作者 Changyong Rhee 为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Lea Sumulong 为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和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学家，Shahin Vallée 为欧盟理事会经济顾问，曾在 Bruegel 任访问学者。本文于 2013 年 11 月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自然利率研究框架综述

Jérémie Cohen-Setton/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本文围绕维克塞尔框架对自然利率的讨论及该理论的学术争议，对自然利率的研究框架作了综述性回顾。编译如下：

在近期对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讨论乃至大萧条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自然利率都是关键的要素，但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透彻，部分原因在于该术语对不同人群而言有着不同含义。

约翰·科克伦（John Cochrane）写道，在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思维中，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潜在产出函数中使用的“自然利率”明显为负。而在通胀水平“仅为”2%且名义利率保持为0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无法提供比-2%更低的实际利率。所以，如果“自然利率”约为-5%，那么我们就被困在3%的“过高”实际利率上了。

维克塞尔（Wicksellian）框架

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认为，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以资本边际产出和贷款成本的比较为其理论基础。如果当前利率低于资本回报的自然利率，企业家就会贷款来购买资本（设备、建筑等），增加对各类资源的需求从而推高其价格；如果当前利率高于资本回报的自然利率，情况就会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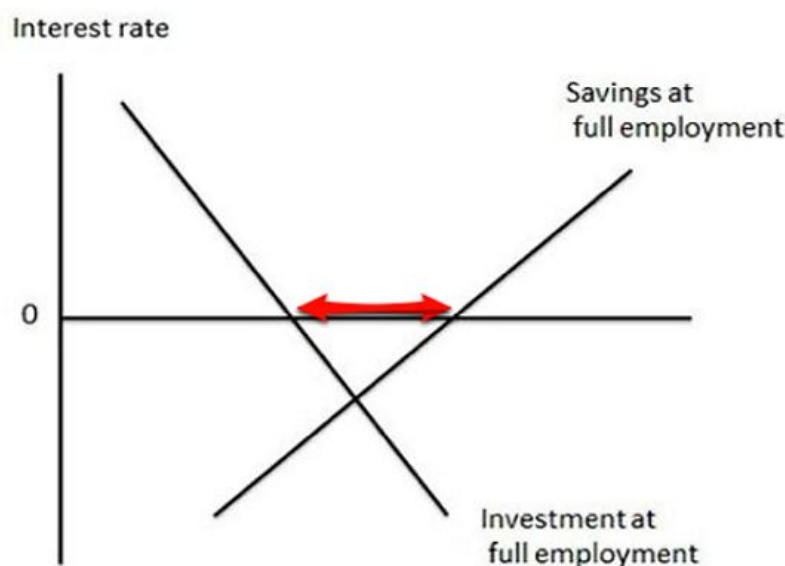
阿克塞尔·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认为，维克塞尔的术语泄露了他对“中性”货币体系这一古老追求的参与。中性货币意味着，现实中相对价格的形成与在无纸币世界的假设情形下相同。理查德·安德森提出，尽管维克塞尔想阐释货币数量论背后的传递机制，并开始以自然利率概念修正货币基础、银行信贷的延期、总需求和汇率，但他的工作奠定了20世纪经济学家背离货币数量论分析的基础。

格雷戈·伊普（Greg Ip）认为，维克塞尔将金融汇率视为银行为发放贷款进行竞争的产物。这一工作现由央行执行，他们仍以维克塞尔的术语为理论基础：经济体充分就业时的利率即为自然利率。若将政策利率定在自然利率之上，经济体就将陷入衰退，定在自然利率之下则会导致通货膨胀，或引发令人担忧的投机性信贷繁荣。

自然利率、储蓄与投资

阿克塞尔·莱琼霍夫德认为，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1939）与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1939）精炼了这一概念，尤其是通过事前计划与事后实现间区别的引入，阐明了维克塞尔理论与国民收入分析间的关系。

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认为，在维克塞尔框架中，自然利率是计划性投资（加上来自政府的净借款）与充分就业下的所需储蓄（加上来自国外的资本净流入）相等时的利率。如果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计划性投资将高于所需储蓄，寻求投资的企业无法售出足够多的债券来为投资行为融资，因此动用现金储备，使货币成为烫手山芋，从而导致意料之外的通胀上升（和充分就业甚至劳力不足）。



来源：布拉德·德隆

尼克·罗（Nick Rowe）注意到，联邦政府不仅能降低市场利率，还能试着提高自然利率。通过做出某些（或承诺在未来做出某些）增加预期的未来实际收入、增加当前所需投资和降低当前所需储蓄的事，联邦政府本身就能提高自然利率。这件事的另一种说法是，对自然利率进行短期与长期概念的区分是很有帮助的——长期概念假定预期与未来自然利率下的经济一致。自然利率不是一个数字，而是时间路径。

自然利率的其它定义

迈尔斯·金博尔（Miles Kimball）在网上看到了许多对自然利率的困惑，主要源于中期自然利率与短期自然利率的并存。

中期自然利率指，当所有价格与工资的粘性突然消失时，现存技术水平与资本条件下的利率，即在粘性价格、粘性工资或粘性价格-粘性工资模型背后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的利率，它不是一个常数。事实上，在入门级宏观经济学中，可贷资金市场的标准模型就是关于如何确定中期自然利率的模型。

短期自然利率指经济体实际情形下扣除折旧的资本租金率。低产出水平降低了净租金率，因而降低了短期自然利率。暂不论经济体面临的其他冲击，除非利率被定在低于短期自然利率的水平上，否则货币政策无法使产出增加。

本文原题为“Blogs review: The natural interest rate framework”。本文作者为 U.C. Berkeley 博士候选人，曾任英国财政部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基尼系数为什么迅速提高？

Davide Furceri 与 Prakash Loungani /文 刘洁/编译

导读：收入不平等状况现已达到历史高点。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国民收入的一半。这种掠夺性的分配状况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美国从未出现过。在很多发达国家，近期这一恶化速度已经升至20多年来的最高点。本文揭示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两个原因，即资本账户自由化与财政整顿政策，并建议各国政府应在这些政策与其带来的分配效应之间作出权衡。编译如下：

收入不平等状况现已达到历史高点。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国民收入的一半。这种掠夺性的分配状况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美国从未出现过。截至2010年，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面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过去3年内比过去12年内更为严重。近期，在很多发达国家，这一恶化速度已经升至20多年来的最高点。

如何解释这种恶化局面呢？大量工厂正在运转。近几十年的技术变革为那些能够熟练操作计算机和拥有信息技术的人带来了福利。全球供应链已将低技术产业移出发达国家。这就造成发达国家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直线上升，进而抬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那些只具备低技术的工人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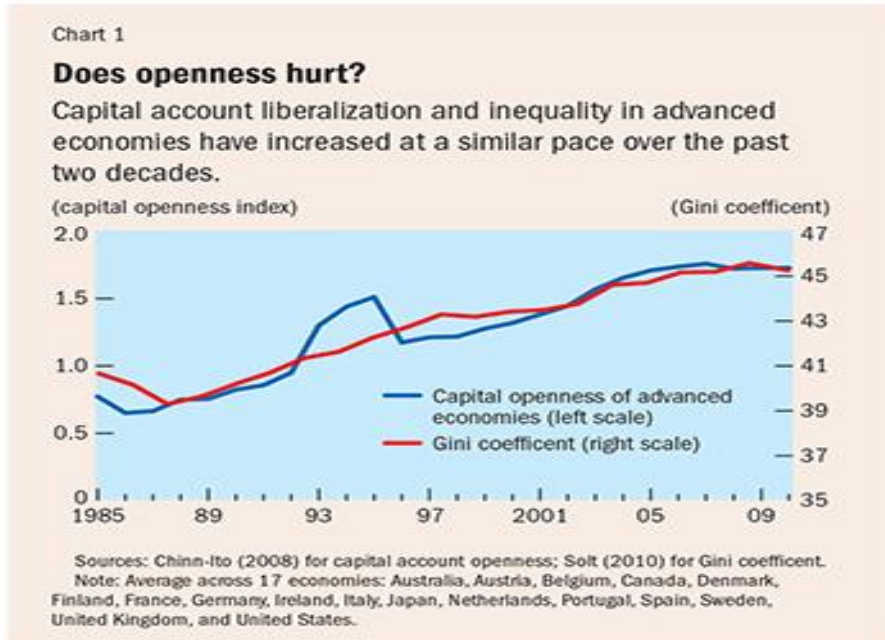
近期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对外资进入与竞争的开放，也即资本账户自由化。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这些政策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财政整顿，或者财政“紧缩”。

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或财政整顿。毕竟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评估确定它们对经济有益才实施的。本研究要表明的观点是应在这些益处和它给收入分配带来的冲击之间做出权衡。有些时候政府或许可以制定政策减轻这种冲击。IMF 总经理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建议“财政政策不仅要注重效率，还要注重公平，特别是在共同分担调整责任上的公平，以及在保护弱者时体现出的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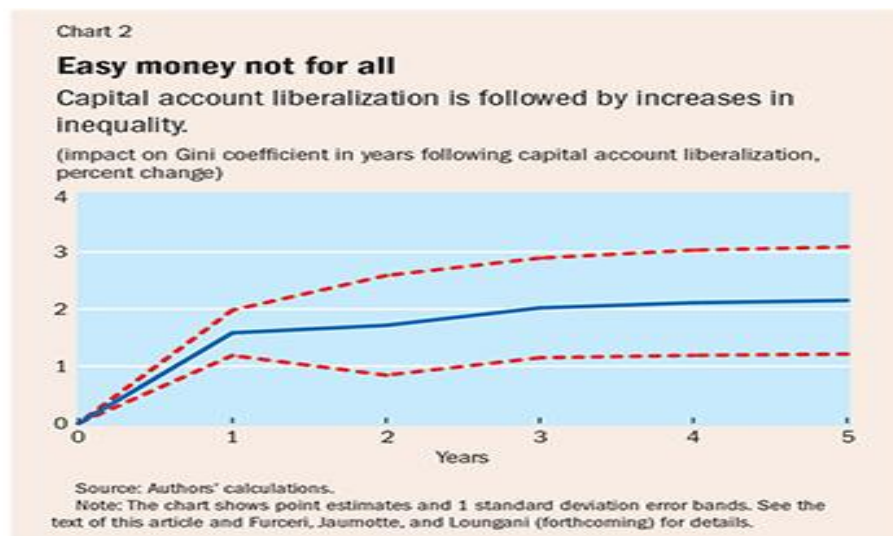
开放造成不平等

过去三十年内，各国对跨境金融交易的限制大大降低，这在IMF的《外汇安排与外汇限制年报》一文中有所提及。这些报告中构建的资本账户开放指数

显著增长，即跨境金融交易的限制逐步被取消。同时，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加重，这一点可由基尼系数体现。当一国的所有收入被平均分配时，这一系数值为零，当一个人拥有全部收入时该值为 100（或 1）（参见图 1）。



为了揭示两者的发展是否相关，我们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指数大幅变动的情况，这代表政府为推进本国金融业开放所制定的政策措施。根据这一标准，在 17 个发达国家中有 58 次大规模的资本账户变革。这些变革对收入不平等有什么影响？平均来看，在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后紧接着发生的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剧烈且持续性的增加。自由化之后，基尼系数每年约增加 1%，五年后增加约 2%（参见图 2）。



该结果的稳健性也被记录在我们的研究中。特别地，即使存在大量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其他因素（比如产出、贸易开放、政府规模的改变、产业结构变革、人口结构变革、以及对产品、劳动力和信贷市场的监管），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冲击也是成立的。

资本账户开放有很多渠道能够对收入不平等加重产生影响。例如，这种自由化允许财务有限公司从境外借入资本。如果这些资本用于补贴技术工人，那么对这些工人来说，资本自由化就增加了他们的相对需求，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事实上，研究已证明：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工业中更为显著，因为工业更依赖于外部融资，并且用于补贴技术工人的资本比例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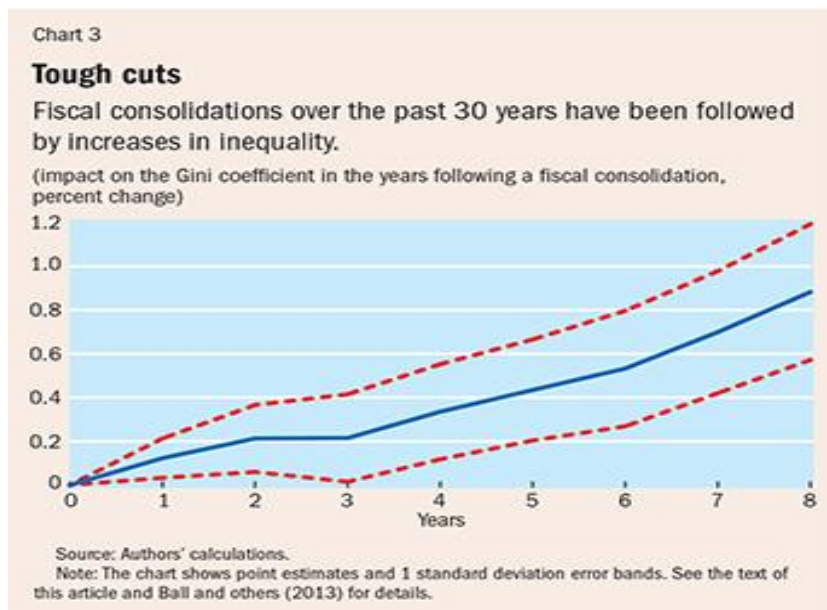
谁受伤了？

财政整顿——削减支出并增加税收以降低财政赤字——是一种常见的政府行为。因此有很多历史经验能指导我们去研究这些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过去 30 年内，我们的 17 个发达国家样本中有 173 次整顿发生。平均来看，这一政策使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降低了 1%。

很显然赤字削减之后紧接的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财政整顿两年后，基尼系数增加 0.2%，8 年后基尼系数增加将近 1%（图 3）。

对上述结论的一种解释是：尽管财政整顿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相一致，但实际上存在第三个因素能导致这两者共同变动。例如，经济衰退会造成分配不平等程度加剧，同时也会导致债务占 GDP 比重增加，这就意味着财政整顿的几率增加了。然而，即使控制了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财政整顿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依然存在。其他对于这些结论的稳健性检验将在 IMF 的两篇论文中有所涉及。

财政整顿会通过很多渠道加重收入不平等。例如，通常与财政整顿相关的社会福利、公共部门工资以及就业率的降低或许会对低收入群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财政整顿对长期失业的影响是另一种可能的渠道，因为长期失业将会与收入大规模降低有关。



政策建议

资本账户自由化与财政整顿都将带来福利。前者允许国内公司涉足国外资本池，并常常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获得国外技术。它还允许国内储户投资于国外资产。如果能够合理管理，这种扩张的机会将极具收益性。同样，财政整顿一般以降低政府债务至安全水平为目的。低债务反过来也会降低利率进而有助于经济发展，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政府在拥有较低利息支付负担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削减税收。

然而，当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对很多国家政府来说成为一大难题时，如何在这些好处与分配效应之间进行权衡也非常重要。意识到这些分配效应或许会使一些政府制定政策来处理这些分配效应。例如，更多地采取累进税并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将有助于减缓财政整顿对收入分配造成的影响。政府还可以通过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来减缓长期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本文原题为“Who Let the Gini Out?”，作者 Davide Furceri 和 Prakash Loungani 分别是 IMF 研究部的经济学家和顾问。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刊于 IMF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元区的幸存——惨淡的胜利？

Nicholas Crafts/文 陈博/编译

导读：欧元区在欧债危机之中幸存，但也留下了较多隐患。金本位体系的解体或许能给我们一个历史参考，让我们更好地评价欧元区的得失。作者认为，当时退出金本位这一固定汇率体系事实上有助于各国复苏，今天的欧元区尽管维持了相对完整，但也错过了很多复苏的机会，付出了一定代价。编译如下：

欧元区在欧债危机中得以幸存。而此前不少人估计至少有一个国家会退出欧元区。这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金本位体系在危机中全面解体。

表面上，欧元区的幸存是一个胜利。但是，别忘了当年金本位的解体其实是走出大萧条的重要一步。较早进行汇率贬值的国家，如北欧诸国，在当时更快地进入了复苏。债务违约国之后也出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使得人们提出疑问：今天欧元区的保存和伴随的救助措施是否带来较高的代价，如黯淡的增长前景？同时，虽然欧元区各国没有经历大范围违约，但在高企的公共债务/GDP 重压之下，各国该如何应对？最后，财政可持续性能否在不损害增长的情况下达成目标？

我们能从 19 世纪 30 年代的危机中学到什么？

1929 年前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但是 1936 年末随着法国货币大幅贬值，这一国际货币体系基本宣告破产。尤其是 1931 年 9 月英国的退出对金本位体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Wolf（2008）发现，一个国家退出金本位体系的可能性随着其贸易伙伴退出而加大，同时也和其考虑物价后的实际汇率、是否是民主政体和中央银行是否独立有关。而黄金储备较多、国内物价通缩较低、银行体系较稳健的国家退出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制国家更容易退出金本位。这或许是因为，为了留在体系之中，当时的国家必须采取通缩性措施来降低本国物价，增强贸易竞争力，并防止资本外流。但国民的政治阻力也会极为强大。这也可以从当时仍在金本位中的英国央行提升利率时的犹豫看出来（利率仅仅上升至 4.5%）。

众所周知的是，留在金本位之中阻碍了各国的复苏进程。当时的经济危机中，各国为了留在金本位之中必须承受通缩的压力。因为“不可能三角”理论已经表明，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本国应对经济衰退带来的通

缩而实行的宽松政策会被资本外流所抵消。因此，各国必须协调好利率政策。但国际协调在当时的环境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退出金本位体系给了各国更大的货币自主权。

当时另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大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使得全球贸易总量大约下降了 9.6%。在缺乏类似 WTO 这类约束的情况下，保护主义往往是为了维护就业。金本位体系中的国家往往更借助于保护主义，以弥补其在货币政策上有限的自主权。

此外，英国退出金本位体系有助于偿还其在一战中欠下的巨额债务。这是因为，维持债务规模稳定所要求的财政盈余和债务规模、真实利率正相关，和真实 GDP 增长负相关。一旦通缩结束，利率能够被有效削减，同时 GDP 增长复苏，债务偿还压力也就显著下降。其中允许利率自由降低至低点非常重要。

大萧条的另外一个经验是与债务违约相关。分析表明，违约有助于重债国家更快复苏。但当年和今日的区别在于，当时的大部分债主是私人部门，而不是银行等金融部门。这使得政府对违约的态度更加宽容。而如今对系统性风险的担忧使得政府对违约的容忍度在下降。

可以看出，当年的经验教训有几点可借鉴之处。第一，汇率贬值和有限度的违约有助于复苏。第二，退出金本位会引发连锁反应。第三，当传统的刺激措施难以实施时，保护主义会抬头。最后，通缩使得债务偿还变得非常困难，特别是当通缩对恢复贸易竞争力至关重要时。

那么，为什么今天欧元区没有像当时的金本位一样解体呢？第一，从欧元区退出的难度加大了，各类条约具有约束力。第二，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二者会形成恶性循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较当年成倍放大（对于奥地利、法国、爱尔兰等六国来说，这一数字是 3 倍），系统性风险加剧。第三，一国违约的后果更容易传导至其他国家。因此，欧央行执行了 OMT 计划以挽救濒危的欧元区。

但我们不能忽略了欧元区幸存的几个惨淡后果。第一，留在欧元区，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根本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第二，未来几年经济增长前景依旧黯淡，失业率高企。第三，竞争力问题没有解决。除了希腊，大部分边缘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都不降反升。最为重要的是，当前欧元区国家的债务水平较

高，带来的沉重负担还会拖累未来数年的经济增长。这一切都使得欧元区的幸存最多只是一场惨胜。

本文原题名为“Saving the Euro: A Pyrrhic Victory?”。本文作者 Nicholas Crafts 为 Chatham House 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3 年 11 月刊于 Chatham Hous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

Steven Barnett/文 孔莹晖/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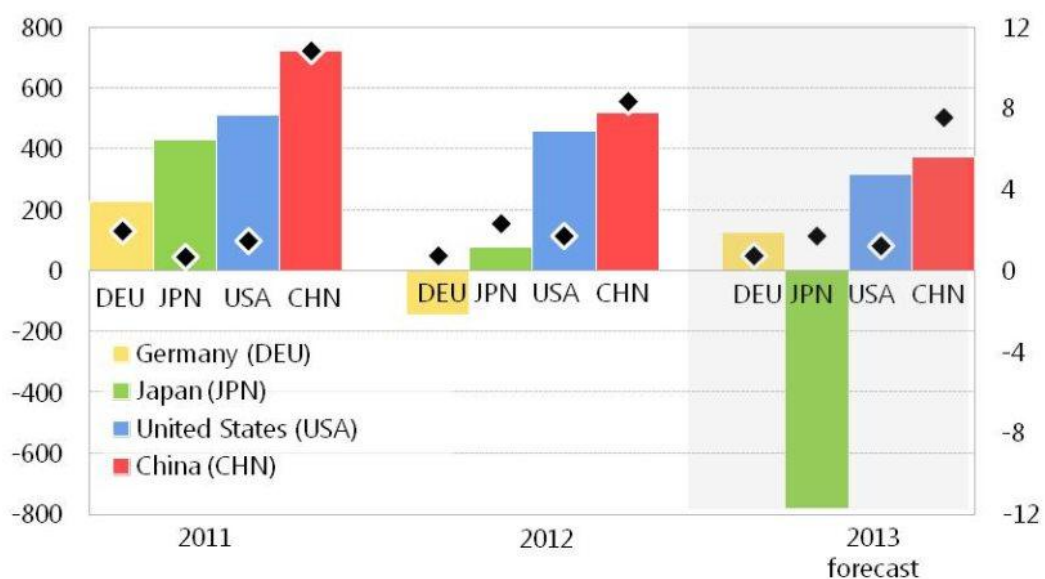
导读：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消费疲弱。但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作者认为，随着改革推进，中国的消费占 GDP 比重终将上升，并最终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编译如下：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今年很可能还是如此。然而，人们仍然普遍认为中国消费疲软。中国政府和 IMF 都在呼吁消费之于经济增长的更多贡献。那么中国的消费怎么可能事实上保持强劲增长，而却被认定为疲软呢？

消费并不疲软

下图显示了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用美元衡量的消费增幅。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消费增幅都是最大的（柱状图所示，左轴）。而且中国消费的实际增长率也是最高的（黑点所示，右轴）。用美元衡量的增幅由消费增速、经济体的规模和汇率三者共同决定。对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使以美元计算的消费增幅更大。同样地，日元贬值也是日本消费下降的原因之一。因此，无论用美元还是实际增长率来衡量，中国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

图 1 总消费增幅（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IMF 计算。

另一方面，中国的消费占 GDP 比重确实在下降。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消费占 GDP 比重下降约为 10%。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 GDP 高速增长，且比消费增长更快。这只是计算方法的问题。实际上，在过去十年间，消费每年以 9% 的速度增长，略低于 10% 的平均 GDP 增速。

消费占比下降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储蓄率上升。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尚不完全清楚。一个较为流行的解释是预防性储蓄。家庭不能确定政府能提供多少医疗、教育和养老金，因此人们为了应付意料之外的未来开支，会进行更多的储蓄。二是居民收入增长慢于 GDP。跟上面所述相同：居民收入在快速增长，但赶不上 GDP。

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

简而言之，构建消费驱动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提高消费占 GDP 比重。然而，对宏观经济学家来说，消费驱动型增长是一个外来概念。我们往往从供给角度来解读经济增长：资本（工厂）、劳动力（工人）和技术（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决定产出（GDP）。而消费驱动型增长也能从供给角度进行分析。

扩大服务业部门是构建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关键一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部门的产出和就业规模都较小。随着服务业部门占 GDP 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从而消费）占 GDP 比重随之上升。此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还能降低消费者服务业的价格，从而增加销售。

其他改革措施也能起作用。目前服务业部门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金融部门的不断健全能为服务业部门的扩张提供资金支持。健全金融部门还能直接提高居民收入，因为新的理财产品可以增加投资收入。同时，社保改革有助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此外，目前工资税税负过重（雇员和雇主税负往往超 40%），降低税率能直接降低税收，并间接促进就业，从而提高劳动力收入。

这只是其中一些例子。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许多改革措施都有助于提高消费占比。提高资源税、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土地改革都能提高居民收入，并降低居民储蓄，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发展重心转向服务业。

随着改革推进，最终结果将是消费占 GDP 比重上升，推动中国经济转向更平衡、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同时，服务业部门将扩大，家庭储蓄率将下降，劳动收入占比将上升。这还意味着中国将走向更具包容性的（劳动力市场改善）

环境友好型（与工业相比，服务业污染少）发展道路。而且，由于消费增速将快于 GDP 的增长，中国将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本文原题名为“China: Fastest Growing Consumer Market in the World”。Steven Barnett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地区主管。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刊于 IMF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产业集聚与出口政策

Banri Ito, Zhaoyuan Xu, Naomitsu Yashiro/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研究了中国的产业集聚与出口表现，并提出三个政策建议：第一，出口政策应充分利用产业集聚效应；第二，政府应提供出口培训等公共品；第三，低附加值产业与内陆产业面临更高出口成本，应给予补贴。编译如下：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都开始意识到提高国际化公司集聚度的重要性。出口可以让国内市场较小的本土公司享受规模经济。而对中国这样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可以促使公司研发先进技术，反过来推动国内创新

（Breznitz and Murphree 在 2011 年有这样的案例研究）。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可以使其更好地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和面临激烈进口竞争的行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较大，这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生产率足够高的企业才能获利。通常认为，知识密集型开支是进入国外市场的必要成本，如建立分销网络或开发新产品来迎合国外消费者的偏好。若真如此，富有经验的出口商的知识溢出也许可以降低出口的进入成本。

最近，我们研究了大量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层面数据，来评估当前出口商的集聚是否有助于中国企业的新产品进入国外市场。尽管中国的产业集聚日益加深、与出口商的互动越来越紧密（Ge, 2009 and Lu and Tao 2009），但尚未发现来自出口商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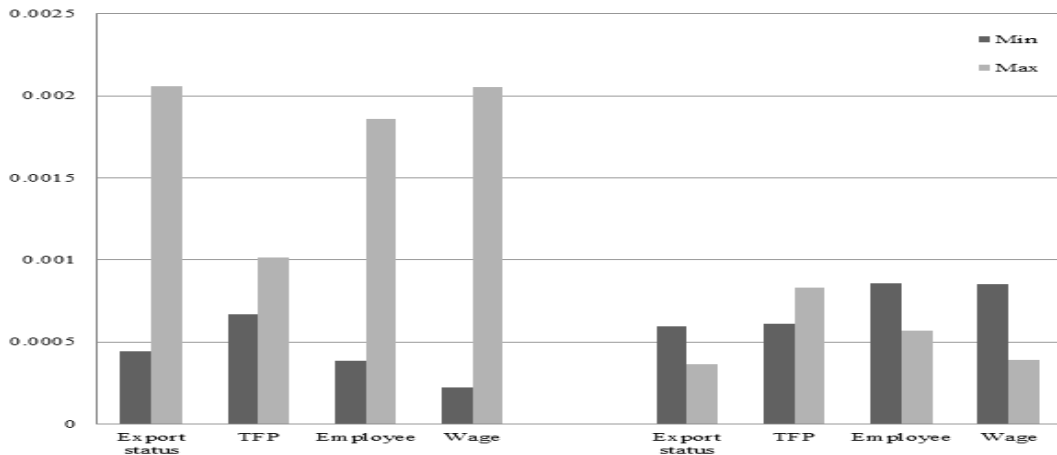
知识溢出具有局限性和复杂性

通过对一个改进的出口进入模型进行估计，我们发现，出口商的集聚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进入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出口商都位于同一地区时，这种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也意味着，出口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局限的。据观测，技术知识的溢出具有局限性；在国外市场，申请技术专利比依靠附近企业的技术溢出更加现实。

当考虑到出口商和出口进入者各自的特点时，知识溢出就变得复杂了。我们发现：集聚提高了中国本土企业成为出口商的可能性，但降低了外资企业的这一可能性。这是因为，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本土企业进入国外市场。但外资企业通常支付更高的工资，提高了要素市场的价格，如熟练劳动力市场（Aitken et al ,1996 and Lin et al 2009）。以较高的成本雇用能够管理全球业务的高级经理人，将大大增加开始出口的成本。这样的负面溢出效应或阻塞效应抵消了知识溢出带来的好处。另外，本土企业可以向附近具有出口集聚的外资企业提供产品，而不用直接进入国外市场。通过外资企业的间接出口越来越多，会给具有出口集聚的外资企业与作为出口进入者的本土企业之间带来

负面联系。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来自本土出口商的知识溢出更容易被拥有共同语言及更愿意进入国外市场的本土企业利用。

图 1. 出口商集聚对提升出口进入可能性的边际影响



注：用位于同一产业和同一地区出口商的数量来描述出口商的集聚。假定其它指标取平均值，通过计算一个指标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来衡量集聚的边际影响。出口状态是一个虚拟变量，最大值时取 1（上一年出口），最小值时取 0（上一年没出口）

知识溢出对不同企业参与出口的促进作用不同，这可能取决于企业的“吸收能力”。图 1 显示，当公司的这些指标——上一年的出口状态，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的数量和工资水平等取最大值时，知识溢出对本土公司的影响更大。这表明：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且技术越密集的企业越能充分利用知识溢出。但外资企业的这一差异并不明显。

另外，我们发现：积极的溢出效应对低附加值产业和中国内陆地区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影响更大。原因之一是，低附加值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较低，且与外资企业缺乏频繁的往来，因而比高附加值产业面临更大的出口进入壁垒。而且进入国外市场时，内陆地区的企业要比沿海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另外，对于尚未享受出口促进措施的地区和行业，出口商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也许更大。

政策意义

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经济，许多中国企业，尤其是私人和中小型企业仍是重要的政策目标。出口进入的成本不仅源于管理负担，还来自进入国外市场必要的知识获取。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促进出口的政策应充分利用产业集聚降低出口进入成本的作用。鼓励出口商在特定经济区的集聚，可以有效提升其附近公司的全球参与度。第二，政府应提供出口培训等公

共品。第三，低附加值产业与内陆产业面临更高的出口成本，应给与补贴，鼓励这些企业充分吸收利用外部信息。

本文原题为“Agglomeration and exports”。本文作者分别为 Senshu 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合组织的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对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Lee, Sang-kuk /文 王雷/编译

导读：2013年6月，朴槿惠总统访华，两国共同发布了《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这份文件显示了新时期韩国希望巩固并加强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决心。韩国意识到，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韩国对华政策要做出调整。当前，东北亚战略安全环境竞争加剧，朴槿惠政府希望韩国扮演地区和平协调人的角色。编译如下：

自1992年8月中韩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双边经贸额已从1992年的64亿美元攀升至2012年的2151亿美元，同期，双边人员互访和旅游人数也从16万增长至691万。相对于快速扩展的经济和社会交流，两国决策者也在不断巩固并深化他们之间的政治交往和关系。中韩建交之初，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位为友好合作关系，1998年金大中访华时，双边将关系升级为面向21世纪的互惠型伙伴关系。之后，2003年卢武铉访华期间，中韩关系进一步演变为全面伙伴关系。李明博执政后，2008年两国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

2013年6月，朴槿惠总统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再度确认，要继续维持中韩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进一步完善并充实现有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为成果，《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的发表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尽管共同声明由两国共同发表，但是韩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份联合声明也反映了新时期韩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几个重要信号。

一、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几个关键点及启示

首先，此份声明最重要的特点是表明了韩国希望巩固并加强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决心。换句话讲，韩国明确地表达了一种意愿，即希望将双边关系的合作范围扩大到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合作领域也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同样，韩国也希望加强韩中两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战略对话机制。具体来讲，这套机制包括建立两国副总理级别的对话机制、开通外交部长之间的热线电话，副外长级别战略对话（2008年建立），举行政党间的政策对话以及推动国家政策研究机构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自2011年中韩两国建立副部长级别国防战略对话以来，两国在外交、安全和防务领域也在打造具有深远影响的对话框架。双方在战略利益及相关重大问题上努力打造官方沟通渠道的做法显然是要加强互信，有效地管理风险。不仅如此，两国也同意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犯罪、海盗、金融犯罪等领域加强合

作。通过上述协议，韩国显著扩大了与中国的合作范围，不仅在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

其次，2013 年的中韩峰会及其联合声明表明，韩国已经意识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及其影响力的显著提升，韩国必须要随之调整对华政策。鉴于中韩两国日益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朝鲜核问题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以及朝鲜半岛与中国毗邻的地缘特性，韩国认识到必须要在更广的范围与中国加强合作。与此同时，上述事态也表明，韩国自身也在积极接受一种新的综合安全观念。尽管由于民主化的特性，韩国社会内部日趋多元，而且随着新政府的上台，现在预测国家安全政策的优先取向仍很困难，但是随着上述综合安全观念在韩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信中国日后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因此，目前韩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和取向很可能继续延续下去。

二、关于中国的具体政策问题

2013 年的联合声明涵盖了一系列关键的安全问题，包括朝鲜半岛无核化，东北亚合作促进和平的构想，以及各种海洋问题。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韩国对中国很可能会采取以下政策目标。首先，韩国将要求中国在北朝鲜无核化问题上加强合作，这是当前东北亚面临的最为紧迫的安全威慑。朴槿惠政府致力于调动所有外交资源，推动中国支持“半岛信任进程”，该计划目的是要遏制朝鲜的核计划，同时加强南北之间的对话。由于认为中国可以对朝鲜发挥显著的影响，所以韩国希望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海洋问题及其相关经济和安全影响无疑是 2013 年中韩峰会的另一个优先话题。两国重申将加快了中韩海洋边界划界协定谈判，并在海洋科学、海洋经济、极地研究、海洋勘探和开发以及海上执法领域加强合作。这些问题当然值得重视，21 世纪海洋在国际经济和安全上越来越具有重要作用。在海洋问题上加强对话与合作，对中韩两国非常重要，特别是考虑到两国在西海的共同利益以及有关极地的探索。但是，在上述各种问题中，韩国的优先关注很可能集中于海洋执法问题（具体来讲，就是阻止中国渔船在韩国水域的“非法捕捞行为”，这个问题同样也是韩国民众的关注焦点）。因此，韩国很有可能致力于在黄海划定专属经济区，以避免与中国的进一步摩擦或冲突。

最后，联合声明也提到了东北亚地区和平合作构想，朴槿惠政府设计这一计划的初衷是希望地区各国将合作的重心从经济事务延伸至政治和安全领域，推动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许多批评人士认为，这一计划很难落实，特别是考虑到东北亚国家战略竞争愈发激烈的现实。但是，韩国新政府似乎不为所动，坚持认为这种沟通方式是阻止东北亚爆发冲突和战争灾难的唯一方法。通过坚持

这一计划，朴槿惠政府似乎要将韩国打造成一个诚实的中间人，致力于化解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合作。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韩国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并且仍将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综合性的安全观念、中韩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与社会交往、中韩之间毗邻的地缘关系、全球政治结构、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应该讲，在这些影响韩国对华政策的因素中，除了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变化，剩下因素的影响多多少少都是恒定的。不可否认，超级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竞争加剧了韩国新时期制定政策的两难和风险，这种局面也迫使韩国不得不承担起地区和平协调人的角色，它鼓励东北亚各国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也要遵守普遍的国际规范以及 21 世纪的价值观念。

本文原题为“*The ROK-PRC Joint Statement of the Future Vis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uth Korean Policy Regarding China*”，作者为韩国国防研究院安全与战略中心副研究员，本文于 2013 年 11 月刊于韩国国防研究院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地区海事安全的新热点

Sukjoon Yoon/文 马文龙/编译

导读：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发布划设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立刻引起各方的关注。中国周边国家如美、日、韩等国都早已建立起自己的防空识别区，中国现在划设自己的防空识别区本是无可指责的正当行为，却引来很多非议，本文作者也认为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现编译如下：

简介

地区海洋领土争端已经从海洋表面延伸扩展到其上方的广阔空域，这标志着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增强。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建立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呢？

评论

2013年11月23日中国突然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一区域不仅包括中国的专属经济区，还有有争议的钓鱼岛。在这一区域内，距离日本最近的领土只有130公里。中国要求做好识别，定位和监控任何国家的无论来自陆地还是海上的所有民用和军用航空器。

这一罕见的武断行为可能影响未来几年该地区的海事安全评估。中国的这一举动已经立即引起美国、韩国、日本三国的反制，在没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下派军机飞越通过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与此同时，日本民用航空公司也在日本政府要求忽视中国新的飞行规则的情况下，也由最初的遵守转变为不再向中国通报航行计划。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都没有对此做出明确回应。

什么是防空识别区？

防空识别区是一个涉及一国出于军事目的控制国家周围空域的防御性的概念；它与领土要求或主权问题没有本质的联系。由于现代飞机的高速度，需要事先授权，确定航班计划，以免被视为敌人的飞机，从而可能导致战斗机的拦截和偶然性冲突的发生。

防空识别区通常就像是一个军事空中交通控制器，因此，民用客机进入防空识别区需要事先通报飞行计划，目的地，以及通过防空识别区时的其他细节。自冷战结束以来防空识别区的作用明显减弱；但自9/11事件中远程飞机被用来对付国内在袭击目标后，飞行中的安全才又被重新重视起来。

为什么中国会在这个时候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

在这一声明的背后似乎有三方面的考量。首先，中国人民解放军似乎试图迫使重新评估钓鱼岛问题，其法律地位牵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日于 1951 年单独媾和所签订的旧金山和约。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海军参与了与日本海岸警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在争议水域的充满紧张和进攻性的对抗，同时，中国正通过使用海上巡逻机，以及无人机监视和侦察日本在有争议的海域的空中活动，来寻求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其次，这一声明也是对最近以来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以及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回应。日本的第一个直升机驱逐舰——出云号刚刚下水，同时日本计划在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建立一艘海军情报基地。中国正在制定先发制人的攻击计划，并试图阻止日本在该地区日益增多的空中活动。

在中国强制推出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第一天，中国就派出两个电子侦察机：一架 Y-8 和一架 Tu-154，在有争议的海域执行管理和监控任务，同时日本也仓促出动两架 F-15 战斗机进行拦截。

第三，中国正在试图用一个更微妙的举动来影响韩国。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与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在一个区域有重叠，这一区域包括鹭岛、济州岛西南的一个暗礁，以及韩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的规定建立的一个无人居住的海事科学观测站。首尔已经表达了对这一单方面声明的关注，但北京对首尔的反应与对东京的不同。

在认识到首尔政府已日益疏远现在的日本政府的情况下，中国正在试图在韩国及其美日盟友之间嵌入一个楔子，以挑拨其关系。

为什么说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带有煽动性的举措？

无论多么希望在解决地区海事纠纷上有所进展，但所有通过对话磋商解决这些分歧的机会正在迅速消退。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公海上空已成为一个进攻和防御态势不稳定的主要区域。为了确保航行和飞越的自由(这是各国经济所倚重的)，该地区国家正在追求东亚地区海域一般竞争的军事化。

甚至韩国已经向西海/黄海部署了大约 50 斯派克非视距导弹，以阻止朝鲜远程大炮的攻击，尤其是保护延坪岛，以免 2010 年的炮击事件的重演。

近年来亚太地区未能在维护共同海上安全的问题上取得任何新进展，其结果是潜在的海上作战空间已超出表面进入领空，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伴随着许多东亚国家不断获取水下资源的过程而进一步进入水下领域。

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可能进一步促使其它国家重新武装该地区，尤其是投资建立各国自己的空中力量。中国的邻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国防预算每年继续保持不同寻常的两位数的增长。

该地区真正需要的事什么？

是时候建立一个新的整体海上安全架构，来确保海上安全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首先，应通过争执双方之间的谨慎的双边谈判，来化解双方的分歧。每个国家应避免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措施，寻求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这样可能给地区带来不稳定。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就属于此类。

其次，多边论坛应尽快考虑国际法的地区的适用性。重新评估、审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模棱两可的地方，并对此作出适当的扩展或修改；同时，美国必须尽快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而促进相关国家积极建立一个新的海上管理机制，而不是仅仅是作一个旁观者。

第三，在东亚海域避免危险事故发生的最佳方式是为海上部队和执法机构确定明确的参与规则。最近的冲突也主要涉及海岸警卫队和海洋渔业机构，如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争端，以及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的冲突都属于此类。这一切都已经证明建立一个涵盖海上非军事威胁的参与规则的重要性。

第四，通过双边对话谈判而不是依赖于军事威胁来冲突双方解决利益分歧应成为共识。在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问题高度紧张对峙之际，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本文原题为“[The East China Sea ADIZ:New Flashpoint in 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本文作者 Sukjoon Yoon 为韩国海洋战略研究所（Korea Institute for Maritime Strategy）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发表于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提高了东海争端中的赌注

Sheila A. Smith/文 赵洋/编译

导读：作者认为,中国本次宣布新的航空防卫识别区的举动增加了中日两国在东海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同时,这种行为也被视为是对美国的挑战,因此美国对此表示了明确的反对。在这一地区中日两国不断增加的军事互动提高了冲突发生的风险,因此在减少风险和避免误判方面展开合作应该是中日两国的首要任务。编译如下:

上周末,中国在中国东海宣布了一个新的航空防卫识别区(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由于中国在东海已经在海洋边界问题上同其他国家拥有矛盾,又在同冲绳相邻的尖阁群岛(中国称作钓鱼岛)上同日本拥有主权争议,北京此次单方面宣布它对于航空区的控制更加剧了在东北亚地区海洋关系的不可预测性。这也发生在北京拒绝同东京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国更加加剧了本来已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增加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互动的不可预测性。

国防部宣布的东海防空防卫识别区在地图上北邻韩国的济州岛,南段位于台湾和日本最南端的与那国岛之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宣布两架大型飞机开始了它们的第一次在新航空防卫识别区的侦查使命,而在早些时候的星期日则出现了预警飞机和战斗机。

中国的航空防卫识别区同现存的日本以及韩国的航空防卫识别区相重合,因此这两国的政府也都表达了正式的抗议。更进一步来说,中国宣布航空防卫识别区的行为意味着北京想要控制这个区域的航线。中国国防部要求全部飞过这个识别区的飞机都要提交飞行计划识别、雷达识别、收发机识别以及标志识别,而大部分国家在飞机飞过其领土时则只要求提交飞行计划识别。

日本政府已经拒绝了中国的新航空识别区。在国会的上议院,安倍首相说这“将不会对日本产生任何效果”,而他的内阁官房副长官加藤胜信则向记者表示,航空防卫识别区“不公平地侵犯了在公海上空自由飞行的权利”。在星期一,外相岸田拜会美国驻日本大使卡罗琳·肯尼迪,寻求美国支持建立反对中国新的识别区的国际联盟。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宣布识别区的行为同缓解去年夏天因尖阁群岛问题而引发的中日关系紧张的努力背道而驰。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当中国的一艘护卫舰将它的射击控制雷达锁定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驱逐舰的时候,两国围

绕着争议岛屿的紧张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缓解。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围绕着海洋问题上的互动都是可预测的，尽管当北京在9月9日派遣了一架无人机到岛屿附近的时候新的紧张关系有可能出现。日本对此的回应是它将会击落任何进入它的领空的无人机。

近来，中日关系有了一些改善的迹象。尽管中国政府仍然拒绝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间的峰会，工作层面的对话在中日两国之间一直得以保持。而且，诸如北京——东京论坛这样的第二轨讨论也得以重启，而这包括了敏感了海洋权利的话题。来自两个国家的商业领袖代表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国关系的缓解。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席则对于联合会近期对于中国的访问没有改变中国对于日本的态度表达了失望。

北京宣布航空防卫识别区的举动将日本置于困难的境地。对于东京来说，识别区看起来实在试图削弱日本对于尖阁群岛的行政控制权。去年，中国向尖阁群岛派遣的巡逻舰数目同日本海岸警卫队派遣的舰数之比是24比7。随后中国努力测试日本在争议岛屿问题上的军事准备程度，而这也对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施加了压力。

中国在东海宣布扩大航空防卫识别区的行为不仅挑战了它在东北亚地区的邻居，它也直接对美国构成了挑战。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中国宣布识别区后立即表示了美国的“关注”。哈格尔表示，“我们将这种行为看作是试图改变地区现状的和不利于地区稳定的。这种单边行动增加了误解和误判的风险。”除表示华盛顿将同它在本地区的盟友保持紧密合作之外，哈格尔表示中国的行动“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改变美国军事力量在本地区的行为方式”。

一天之后，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驳回了美国的抗议，并且警告美国在中国和日本的争端中“不要站错队”。“我们要求美国切实尊重中国的国家安全，停止对中国建立航空防卫识别区的行为进行不负责任的评论，并且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做出具体的努力”。

避免军事冲突以及防止误判是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决策者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本次宣布航空防卫识别区的举动只能是增加了风险，深化了怀疑。在减少风险方面开展合作应该是首要的任务。

军事力量应当被置于一个优先减少风险而不是增加在东海的共同海域和空域当中的军事介入的政治框架当中。日本的防卫力量一直以来被限于自卫的用

途，并且也拥有一个“专属防卫”的原则来指导其训练和行动。在 1987 年一架苏联轰炸机侵犯日本位于冲绳附近的领空之后，航空防卫识别区的规则第一次得以确认。在北方，日本的军事力量一直同俄罗斯有着大量的接触，并且也发展出了一种监控军事互动和组织风险行为的规则性磋商机制。

现在也强烈地需要削减海上风险的措施。在 2011 年刚刚开始的高级别海洋对话在 2012 年紧张发生之后停了下来。最终日本和中国需要达成一个海洋协议，以规定在公海当中遇到事故或误判的时候指挥官的回应方式。甚至在冷战最严重的时期，美国和苏联海军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也会相互依赖对方的援助。

在日本和中国，对于岛屿争端的大众情感也变的十分敏感，两国政府在找到一种方式来解决它们的分歧方面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北京本次宣布防卫识别区的行动只能加剧日本和中国在尖阁群岛地区不断增加的军事互动有可能导致冲突的风险。甚至中国国防部也承认去年一月开火控制事件的危险，尽管它否认中国军队应该对此负责。这样看来，在这个北京拒绝同东京就降低风险进行讨论的时刻，增加两国未来的军事互动很明显是鲁莽的。

本文原题为“China Ups the Ante in East China Sea Dispute”。本文作者希莉亚·史密斯（Sheila A. Smith）为外交政策委员会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刊于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2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4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5 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 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爾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 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2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CSIS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5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1 名。

网址：<http://csis.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 1921 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 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 20 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24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7 名。

网址：<http://www.cfr.org/>

Adam Smith Institution (ASI) 亚当斯密研究所

简介：ASI 是英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政策自由化的改革领导者。它以《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命名，方针是经济自由主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立以来，它在积极实践把选择和竞争引进到公共服务上来，在巩固个人主义、减税、消减落后法规和杜绝政府浪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协会通过他们的研究、报告、学术会议、政治家和期刊的简报、网站和博客、报纸、广播和电视来推广和散播他们的理念。在《2012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ASI 在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7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10 名。

网址：<http://www.adamsmith.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 2005 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 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2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8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1 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